

试论教育成为社会排斥力量的历史路径

刘精明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社会上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其他阶层的排斥经历的四个主要阶段, 即血缘排斥、地位排斥、财产排斥与教育排斥。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排斥的力量, 是在不同的在历史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 它与以往的社会排斥相比, 具有更高的社会开放性程度。

关键词: 社会秩序; 社会排斥; 教育排斥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任何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持都要处理一系列的社会阶层结构关系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 社会上层如何将已有的地位优势保持下来, 并成功地应付和化解来自下层精英的挑战和威胁。长期的社会历史经验表明, 上层阶级的利益的维护需要有某种社会排斥的手段, 同时也需要一种与下层社会有效联结的方式。这正是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挑战与维护基于阶层结构的地位优势的社会活动, 贯穿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不同的挑战与维护的技术手段, 影响着社会统治的基本形式。从历史上看, 上层地位优势的代际延续或对下层侵入的拒斥, 经历了四种基本的社会排斥形式: 血缘排斥、地位排斥、财产排斥与教育排斥。

典型的血缘排斥以世袭为特征, 并通过武力来维持。原初的形式是通过战争形成的军事力量对下层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种统治力量的维持下, 上层地位优势可以通过世袭方式传递到下一代, 将权力、财富垄断在少数几个家族中。下层的挑战和骚乱通过武力镇压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奴隶主的统治时期, 在采邑制的封建王国时期, 上层社会世袭化的再生产依靠的就是这种武力。在这个时期也存在大量的教育现象, 但是, 这时的教育并非独立的排斥性力量, 教育所具有的排他性, 仅仅是世袭排斥的附带性后果。教育对于世袭贵族来说, 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犹如农夫的后代自小就需要辨识五谷一样。

然而, 单是用武力来维护上层社会的世袭化再生产, 其危险性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方式。且不说王国之间经常性的争战、异族的入侵, 常常对原有的上层社会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同时, 对武力的崇尚也养成了一个社会内部的暴戾和桀骜不驯, 过分的武力压制势必激起同样的暴力反抗, 一旦出现下层精英驾驭这种暴戾氛围的情形, 上层社会世袭化的再生产就会自然受到严重的威胁, 武力排斥的结果只能造成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武力对抗。下层精英常常领导或附着于集合起来的民间武装力量, 与统治阶级相对抗, 失败方的代价是整个集团、整个部落、整个家族从肉体上被消灭。

整体性消灭的恐惧使后来的统治者注意到了对下层精英的利用问题, 统治秩序由此开始进入地位排斥阶段。到了封建时代, 给下层精英以制度化的晋升途径, 从而化解来自下层精英威胁的方式被发展起来。在这点上, 东西方的差异是给予下层精英晋升途径的不同。典型的中世纪西方社会以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为基础, 其中下层精英的有两个主要上升途径。一条渠道主要鼓励下层精英从事信仰上帝的活动, 包括进行有限的科学探索, 用以解释服从上帝安排的合法性、在未知的领域发现上帝的存在。这些下层精英活跃于教会、教堂, 并沿着教会僧侣的阶梯序列逐渐上升, 从修士、牧师、神甫、主教、大主教, 有着完整的地位升迁

规例。这是一条下层知识精英上升的主要路径。另一条上升的渠道是进入世俗的地位升迁序列。世俗地位有着较为浓厚的世袭倾向。大多数爵位是世袭的，但是特殊的才能、表现如得到赏识，也可被封赐爵位，尤其是下层爵位。比如在中世纪，受赏赐进入骑士阶层常常是底层精英跨越阶层界限的重要途径。

古代中国则通过科举取仕的办法将下层精英吸纳到上层统治中来。起源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从未间断。通过科举考试即被认为获得功名，学而优则仕，直接进入上层统治阶层。

东西方的这两种方式都曾有效地缓解了上层统治与下层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是爵位、功名、还是神职，在封建时代都是最重要的地位标志，通过控制这些地位财富，统治阶层一方面将下层精英笼络起来，另一方面又成功地建立起地位体系，用以排斥下层民众。在地位排斥的统治秩序时期，古代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分层机制上的差异是，中国社会的地位等级系列浓烈地交混着教育排斥的制度安排，科举形式的教育排斥与封建等级制交织在一起，而西方社会的地位排斥体系则被置于教会权力的控制之下，世俗的地位等级系列与教会的力量联结在一起。

然而有意义的是，科举教育与教会教育在地位排斥的统治阶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阶层提升意义。无论是在神权政治时期的欧洲还是皇权统治时期的中国，教育活动参与地位排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神权政治的统治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面对每一个虔诚的个体，引导他们遵循上帝的旨意，避免受到异教的沾染。于是教会、教廷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中所有有才华的人士，让他们集中在教会的学校中去学习布道、忏悔以及各种宗教仪式，训练他们成为牧师、神职人员，并把他们安排在教会阶梯的等级序列中。熟悉欧洲中世纪史的人都知道，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系中，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一些不服罗马教廷管制的王权，都以不同的方式被消除，异教徒遭到严厉的制裁。在这一时期的欧洲，无论是神职人员家庭，还是世俗贵族，都以进入教会的等级序列为荣。在中国，庞大帝国的统治显然无法通过几个皇族、戚族的成员来实现（且不论皇族之间本身的猜疑也不可能放心地让所有皇族成员都参与朝廷要事、镇戍边关），他们同样需要从下层招揽人才，共同参与其统治事务。帝国的官僚系统职位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填充，这给广大的中下层精英提供了机会。

这时，教育的作用表现了出来。在隋唐以来的帝国时期以及欧洲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教育确实承担起了完成上层社会再生产的基本任务。尽管东西方社会中为下层精英所安排的晋升阶梯大异其趣，但是，教育都是进入这两大阶梯的主要途径。中世纪的欧洲，教育掌握在教会手中，主要的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这些教会学校招收的学生，并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子弟，一些家境贫寒的子弟也常常为某些慈善的教士、牧师所接纳。据《圣经》记载，最初的教会学校就是为跟随耶稣一起传道的教友的子民所开设的，其中不乏贫寒。当世俗权力日益与王权结合，一些家境富有的世俗家庭单独或者联合起来，延请教师在家中教育自己的子女，王室成员也同样聘请当时有名的教师、学者在宫廷或自己的府邸中教授自己的子孙。但世俗家庭教育的内容仍然以对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和解释为主，以其子弟充当教区牧师为指向，通过学习教义和宗教礼仪来获得教会的认可，从而跨入神职的阶梯。这样，世俗特权与教会权力结合了起来，并受到来自罗马教廷的宗教力量的保护。这种世俗特权需要以教义的掌握和理解为标准来获得教会的认可，它改变了纯粹的特权世袭的模式，上层社会由此出现了缓慢的更替。在古代中国，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由皇帝或皇帝派出的官员主持，考核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并附以对诗赋方面才华的检视。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大多需要经过多年的准备，这只能是家境富有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教师开馆授徒、或者合族延师受业，都是家族或富有家庭为维持、提高日后的社会地位所必须的教育活动。一些通过经商而发达起来的新贵，也必须广置地产，以恒业固守一方，然后通过子弟在科举中的晋升来获得社会声望和地位，真正跻身于上层社会之中。当然也有些例外，那就是在朝代更替或抵御外

族入侵的战争中，拥有军功的将士常常能得到特别的奖赏。但是，要维持这些通过战争而获得的特权，仍然要靠后代在举业方面的成功。相反的方面也证明了教育在继续上层社会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黄巢、李岩、洪秀全等，都是在科举考试失败后起事的，而在这样的时期，也正是科举考试的弊端暴露最明显的时期（何怀宏，1998），上升的渠道被阻塞了，下层精英自寻出路对原有上层社会就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中世纪时期的西方社会以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为基础，教育集中在教会学校之中，即使是家庭中的教育，教学的内容也为教会势力所控制。众多的知识精英集中在一起，研究探讨宗教典籍，讨论和解释上帝造物的神圣与合理，讨论上帝超然的能力，甚至有限地进行科学探索、用以来解释服从上帝安排的合法性也受到鼓励。他们之中常常出现许多不同的见解或派别，不过多数情况下都为地方教会或罗马教廷所调停，只要这些见解没有超出教廷所允许的范围。这样的经院研究耗尽了无数知识精英的毕生精力，一代代社会精英在服务于神学的过程中，无形中也降低了他们对上层社会的威胁。在知识发展的旨趣上，西方经院式的研究，通过辩论上帝的存在及其超然的力量，发展起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同时也萌发了对自然界积极探索的精神。古代中国则通过科举取仕的办法将下层精英吸纳到上层统治中来，教育主要是靠背诵的方法，对经书典籍的掌握程度，常常决定他们在仕途方面的前程。在知识发展的旨趣上，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多以通过对经书的理解、掌握来发展其高超的语言文化技巧和案牍能力，以适应其在仕途中诸如讼辩、奏对等方面的职业要求。

知识精英在发展取向方面的差异，是导致了两个社会历史发展大相径庭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知识精英由于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事务，不能直接取得权力和地位，导致西方下层精英在权力以外的领域寻求上升的路径。一个途径是在科学研究上花费精力，并且此途也被给予奖赏，封赐爵位，强化了西方知识分子在科学探索方面的努力。另一个途径是在财富攫取上的努力。由于西方知识精英致力于科学技术的探索，当大量技术应用到生产领域的时候，一些下层社会精英也因此在国内获得了工商业方面的巨大成功，另一些社会精英也因此能够通过向海外扩张来获取财富。这两种方式都是下层精英自我开辟的、传统路径以外的新的上升渠道。精英的视线从国内转向国外，从爵位转向财富，事实上也暂时缓和了上升途径狭小的紧张关系。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当财富逐渐聚集汇合，特别是当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国内的时候，国内阶层结构关系实际上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地位的不一致性加剧了不满情绪的上升，动摇了下层精英对上层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于是一场流血的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原来的统治秩序。西方社会发展便从地位排斥的统治阶段向财产排斥阶段过渡，上层与下层的差异，由封建地位的差异转化为财产等级的差异。

以财产排斥为核心的新统治秩序依旧需要处理上层统治与下层精英的关系。最初以资本起家的统治阶层，力图通过财产排斥的方式来维护已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为了扩大财富的再生产，他们也并不拒绝下层精英的加盟，而是将有管理才能、技术能力的人吸纳到生产与管理组织之中。同时，旋即出现的民族国家的管理形式也给下层精英提供了机会，官僚化的统治机构需要广泛的有才能之士的加入才得以正常运转。这时刚刚产生的现代国家教育制度就适当其时，尤其是高等教育，充当了遴选下层精英的一种主要方式。逐渐地，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垄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社会位置，并设置相应的阶层进入壁垒。这时教育排斥逐渐进入社会排斥的主流领域，成为一支独立的排斥力量。

就中国而言，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财产排斥的统治阶段。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文明冲突，某种意义上是两个社会中知识精英之间的较量，是掌握科学技术的精英与满腹经纶的精英之间的较量。后者的失败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对下层精英的培养方式，废科举、办新学，壬寅、癸卯学制的制定，即是改变精英取向的实践。在清末现代学制初定时期，学龄级别直接等价于功名地位的级别。如在1903年癸卯学制中的《各学堂奖励章程》中规定，学堂种类分为三级七类，并分别与相应的科举功名和授职联系起来，各级学堂毕业，都可以奖得相应的科

举出身并授予官职。这种体例，仍然延续着科举时期地位排斥与教育排斥相结合的特征。后来的现代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直到今天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也并未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以教育排斥为机制的社会分层体系（李路路，2002），尽管这种趋势的端倪已经显露（刘精明，2001）。

上层阶级地位和利益的维护，通过社会排斥手段来实现。血缘排斥、地位排斥、财产排斥与教育排斥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四种典型的社会排斥形式。但这些排斥形式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地位排斥阶段，教育作为一种排斥性力量，强化着地位排斥的强度和固化程度。在财产排斥阶段，教育仍然是有产者的专利，因此，教育排斥的意义，在地位排斥和财产排斥阶段，只是一种附属的形式。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阶层排斥力量出现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它以特殊专业的形成和文凭资格为主要标志，这就是兰德尔·柯林斯所描述的文凭社会阶段。柯林斯指出，“专业的形成是由支配任何一种有意识社群相同的原則所决定的。强有力的专业仅仅是一个特别的职业，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和自我意识的组织。一般而言，职业所展示的凝聚力和权力与文化社群相当”。柯林斯进一步认为，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以学校证书来体现的受教育程度及其群体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市场的竞争形成对报酬优厚的职位竞争的一个限制条件，并且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着这些职位（Collins，1979）。故此，柯林斯称这样的社会为“文凭社会”。

在经历血缘排斥、地位排斥和财产排斥后，教育排斥取而代之成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社会分层机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血缘排斥和地位排斥以阶层地位的先赋性为基本特征，其排斥后果具有某种僵硬的封闭性特征。财产虽然最初也可能是个人成就的一种表征，但是财产本身却具有在代际之间可以直接继承和传递的先赋性质，同时，财产排斥还往往以财产权力的专横性构筑社会地位之间的壁垒，因而也是一种绝对排他的力量（彭玉生，2000）。与上述三种排斥不同，教育排斥是一种渐趋开放的体系，它试图以纯粹的“个人成就”或成功（achievement）来守护既得的利益，因而是对以先赋性因素为主导的阶层分割的否定。形式上，教育排斥具有较多的个人努力的成分，因此更容易为被排斥者所接受，并为社会大众指明了通过个人努力去突破阶层划分界限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朱有漱、戚名：我国现代学制的建立《癸卯学制》述评；见瞿葆奎主编，黄荣昌等选编：教育制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2]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 [3]瞿葆奎主编，黄荣昌等选编：教育制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 [4]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6）。
- [5]刘精明：教育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 [6]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 [7]Collins, Randall,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On the Historical Path Along Which Education Became A Social Ostracizing Force

Liu Jing-mi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holds that social super-stratum, who wants to ostracize other strata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has experienced four main phases: consanguinity ostracizing, status ostracizing, property ostracizing, and educational ostracizing. Being a social ostracizing force,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come into being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social ostracizing, it has a greater degree of social openness.

Key words: social order; social ostracizing; educational ostracizing

收稿日期: 2003-09-22;

作者简介: 刘精明 (1966-), 湖南沅江人, 社会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心研究专职研究人员。